枕边书系列之117 主持:宋庄

柳建伟谈枕边书

中华读书报:可否先谈谈您的阅读经历?

柳建伟:小时候最早接触的小说是《烈火金钢》和《金瓶梅》。是“文革”时期我舅爷拣破烂拣回的两本小说,封皮也破了,内容是石印的,当时都不知道看的是什么小说,后来才知道其中一部是《金瓶梅》,也只看了后30回。

我1979年参加高考,学的是计算机。我在学校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是四卷本小说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,看了一天一夜,没吃饭,没睡觉。军校要求每天10点钟必须休息,我就在被窝里看,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么好的小说。《突出重围》里有浪漫主义和英雄气概,就根基于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对我的震撼。之后我读了《红楼梦》,那是第一遍,现在看了有十来遍了。

中华读书报:对您走上文学道路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什么?

柳建伟:那时看杂志,心想他写成这样怎么也能当作家?大学时就想试一下。文学在我心目中是很神圣的,因为我早期看的小说都是很优秀的名著。当时我很不自信,我一个学理工的,这样做无异于是另类。当时我想了个办法,就是给自己施加一点压力,使压力转化为动力。怎么办呢?很多人开始写东西时都怕别人知道,我正好相反。我开始写的第一部小说是《郝主任的苦恼》,是写计划生育的,因为我们家有个邻居的朋友是计生办主任,我老听她们谈起,于是就写了一篇,写完后自己感觉也不行,但还是寄给了《人民文学》。不久就收到了铅印的退稿信,上面还用钢笔写了五个字“文笔欠精炼”。第二天大家就都知道我写小说了,从那天起我开始有压力。

中华读书报:作家多是学文的。学理工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?

柳建伟:学理工给我的创作打下很好的基础。我认为如果谈长篇艺术的话,首要的是结构,其次才是人物、情节、语言。长篇小说是大工程,要靠持久的体力、智力和创造力。大工程肯定要用图纸的,首先要保证结构。现在很多长篇小说是“半部杰作”,就是因为没有比较系统的操作性。我后来读到很多伟大人物的传记,尤其是托尔斯泰、福克纳、茨威格的作品,我觉得他们都很重视操作性。

大学四年的工科学习和训练,培养出了我的逻辑分析能力、归纳演绎能力和大局整体思维能力。这几种能力,对于一个作家来说,不是仅靠天分就能获得的。有了这些能力,作家便可以把握重大复杂的东西,便可以构思创作规模宏大、人物众多、情节纷杂的大体量的长篇小说。我后来能写出《北方城郭》《英雄时代》《突出重围》这样字数超过四十万字,出场人物超过一百五十人的大体量长篇小说,且能做到基本的整体均衡,大学学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,是基础。中国正处在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时代,用长篇小说反映这样一个时代,理性的分析能力必不可少。

我很庆幸当年在很年轻的时候,得到了长时间的理科和工科的思维训练。今后,这种训练肯定还会在我的创作中产生良性的影响。

中华读书报:1991年,你又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?

柳建伟:我在四川大邑期间,正是金庸热。金庸的作品,我自然是全部熟读了。金庸的《鹿鼎记》应是罕见的文学杰作。有这一部作品,有一个韦小宝,他就是文学大师了。他另外的纯武侠作品,自然也都是侠文学中的杰作。在他构筑的武侠世界里,要想成绝世高手,需三个要素,一是天分加苦练,二是要接触武功绝学秘笈,三是要拜个绝顶高手做老师。我十分认同金庸的成才观。

我在大邑苦修八年,没见什么文学秘笈,更没见到一个文学大家的真容,长期如此,肯定不行。这时候有到北京读书、学习文学创作的机会,我肯定愿意牢牢抓住。

中华读书报:您喜欢读谁的作品?关注同时代的作家吗?

柳建伟:喜欢鲁迅的作品。我认为鲁迅是孤独的斗士,读他的作品,最好在深夜,打开小台灯,拉上窗帘,关了门。而不可能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里荡着秋千读。

我曾经做过论文,就是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的长篇小说都研究过。同时因为我选择了“马拉松比赛”,所以要看看人家是怎么跑法,再研究一下自己,会跑得更快。我对同时代的作家很关注,并对他们的劳动成果认真研读过。我认为如果张炜和贾平凹结合起来天下无敌,使中国文学可以真正跟世界较量。这两个作家是互补的,一个重理性,一个重感性。一种是对形而上的超拔迷恋,对抽象的东西有超拔的力量。像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,从题目中就可以看出对现实,对形而上层面的一种隐喻。贾平凹正好相反,《废都》《商州》,很感性,很细腻。后来莫言出现了,他的长篇小说是看不到头的,看不出在哪个地方出一拳头,把大家都打蒙了。而且这几个人的写作都很刻苦。他们对我起到垂范的作用。我从他们身上吸收了很多营养。还有王蒙、李国文、宗璞。我曾研读王蒙的《狂欢的季节》。我认为是继《活动变人形》之后的大作,确实大气。

中华读书报:可否说说您独到的阅读方式?据说您看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,将上千个人物一一列出关系,连评论家朱向前都感叹:“读书真读到家了。”

柳建伟:工科思维严重影响了读书和创作。读大二时,开始做文学梦,因一个出名的作家都不认识,就对作家的创作谈和评传较为重视。读了一些后,我发现作家的创作谈,有很多是靠不住的,多数人是不谈自己的创作过程的。

从作家创作谈和作家评传中,读不到创作秘笈,我就想到了从作品本身破解创作密码的笨办法。人物是长篇小说的核心。我就从人物关系图谱入手,开始学习。最早做、做得最细的是《红楼梦》。人物关系图谱,需要配上事件和情节流程,才能看出大作品的构成密码。外国作家,我做过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《白痴》和《卡拉玛佐夫兄弟》人物图谱的分析学习。巴尔扎克《人间喜剧》中,人物关系复杂的比较少,做了几部后,也就弄明白了。这一比较,就比较出《红楼梦》更高级了。后来,我就明白了长篇小说的结构,就是一定时空关系系统中人物关系总和这样一个道理。用时空关系系统和人物关系图谱,判定一部长篇小说艺术上的高下,是很靠谱的,学会这个方法,创作长篇小说,大抵是不大会跑偏的。

可以说,古今中外所有优秀的长篇小说,它的时空关系系统和人物关系图谱,都不会出太大问题的。比如,时空关系,你用广场方式搭建后,就不可以用道路方式搭建了,也就是说作家不能在时空关系和人物图谱方面为所欲为。《红楼梦》在这方面做得极严格,也就最伟大。曹雪芹在书中,从来都是把人物放到他构建的时空中来表现的,从不把人物写到规定的时空外面去。书中,贾琏奉命去扬州等地选十二龄官,过程是不能写的,一写就破坏了长篇小说时空关系的锁闭性。也正是基于这一点,我对多数人都很欣赏的《白鹿原》的后半部,评价不很高,因为这本书的后半部的时空关系搭建方式和前半部完全不一样。还有,因为《白鹿原》在结构上没考虑锁闭的要求,就过早地把广场结构中的重要人物田小娥写死了,同时,前半部的主要人物都走出了白鹿原,这就使这部书看上去成了两本书。《白鹿原》受《静静的顿河》的影响显而易见,《静静的顿河》的时空前后一致,女主角阿克西尼亚死后,小说也就结束了。《百年孤独》也遵守我所说的这个规律。《废都》在这方面也无可挑剔。莫言的长篇,早期的像《丰乳肥臀》在时空关系上不大讲究,后期的《生死疲劳》和《檀香刑》就可称这方面的教科书了,在我看来他的后期长篇比早期长篇有价值得多。

伟大作品成功的密码,在作品中藏着,失败的原因,也藏在作品中。

中华读书报:如果要在您的小说中选一本改编成电影,您会选哪一本?

柳建伟:选《北方城郭》。我创作的所有长篇小说,只有《北方城郭》没有改编成影视作品。实际上,这部小说是非常适合改编成电影的。书中男主角李金堂和女主角欧阳洪梅的关系,他们所呈现的复杂性和人性深度,足以支撑一部探讨男女深层关系的艺术品质相当高的电影。我一直期待能有这种改编。

中华读书报: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,您想见到谁?

柳建伟:还是见曹雪芹吧。中国的曹雪芹、苏东坡、杜甫、屈原和鲁迅,外国的莎士比亚、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,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家。只选一个,那只能选曹雪芹。他经历的苦难,不比任何人少,但他对人类困境的悲悯,又是最真诚的和最无差别的,这相当不容易。

中华读书报: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孤岛,您会选哪三本?

柳建伟:我想带上《史记》《红楼梦》和《白痴》。一个人呆在孤岛上,对抗孤独应是第一要事。有《史记》中复活的几百上千鲜活的古代真实人物,有《红楼梦》里写活的几百虚构人物,和《白痴》里最迷人的女性娜斯塔霞相伴,在岛上过个十年八年就没问题了。

中华读书报: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,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,您会邀请谁?

柳建伟:按圆桌十个位置请人吧,共请九人。男作家请我最喜欢的曹雪芹、苏东坡、杜甫、屈原、鲁迅、莎士比亚、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,女作家请上李清照吧。李清照在我看来,文学成就排古今中外女性第一。她一点不装,酒量很好,可以和一桌男人一起痛饮。

中华读书报:如果您可以成为任意文学作品中的主角,您想变成谁?

柳建伟:在我几十年阅读文学经典的过程中,我想成为的男主角很多。年轻时,想成为贾宝玉、梅诗金公爵和葛里高利这样的人,年长些,想体检体验哈姆雷特、李尔王的难处。快到耳顺之年了,认为金庸《鹿鼎记》里的韦小宝活得更有滋有味些。小说中的韦小宝,在我看来,是和贾宝玉、阿Q同级别的顶级典型人物形象。变成韦小宝,一定很有意思。

柳建伟,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,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,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

一念可持续多久

■张抗抗

《一生不过一念》是张林华先生第五部散文集了。

从他青年时代因热爱文学而起念写散文,已经过去几十年了。这一念好长远,几乎持续了他的半生;这一念好宽广,覆盖了他大部分的精神世界。当年那个瘦高清秀的少年,踏着江南水乡湿漉漉的石阶,驾着梦想的小船,从雾气弥漫的码头出发,经过苕溪、英溪清澈的水巷,穿过大运河一座座拱形石桥坚固的桥墩,驶入宽阔的湖漾、浩渺的水域。他望见自己心里涌动的那个念头,犹如水面散开的涟漪,一圈圈一波波朝四周扩展开去。

一念既生,万念收起。

“念头”在时间概念里的短暂性和瞬时性,决定了它是个人化的、私密的,因而是个微小的语词。但念头可以生长、放大、升华或是下沉,铺张或是扩张,比如战争爆发、复仇欲望、爱恋冲动,都有一念即燃、一闪覆水的起因。“一念”是万事万物的原点,从尘埃般微小至宇宙般无穷大。

林华散文集《一生不过一念》中所记述那些当下事,具有对现实生活和现实社会的关注,可为疲惫迷惘的当代人解困除惑;忆旧往事,看似平铺直叙,心念都藏在深处。旧事未了,新事又生,一个又一个善念、俗念、邪念、杂念……心心念念,沉下去又升上来,念头与念头搏击,分分钟纠缠不息,丝丝缕缕此起彼落。“一念”是意识的原生态,即潜意识一种,也是思绪意念的“初级阶段”,因其感性而显其真实珍贵。所谓“一念之差”“一念之误”,就是以错觉幻觉非理性判断是非。若是经过理性的思考解析,“潜意识”形成“思维”,正念构成认知,飞升的气韵进入空无,虚相实相,已是禅的境界。

一念无邪,万念消解。

人生总在长途跋涉,林华跨界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,处理过万千事务,始终保持着严谨沉稳的行事做人的风格,这令他成为一个受人尊敬、获得赞誉的优胜者,他能做到不为世俗所扰,不为声名所累,因为他知道自己心底尚有一念,那是永远无法抵达的终极之地——文学。诉予真诚、寄予真情的水中高台、陆地高塔。亦如翠竹沧海的莫干山顶上,那座若隐若现的裸心堡。

自从他步入文学的圣殿,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,把所有边边角角的时间都用来写作。好似背着一筐筐青青的桑叶,倒入蚕房的竹匾,然后屏息倾听春蚕嗷叶的沙沙声;逐字逐句逐段逐篇,直到它们变成饱满洁白的蚕茧;在静寂流逝的时间里,蚕蛹破茧、产籽孵化……

无数静夜里浮现的念头,在他笔下勾连解析倾诉重组,最终敷衍成文、集腋成书。书中闪过的所有念想,最后都指向了精神场域的探究。沉浮的念头一旦落地,跨越中年焦虑,坦然融入现实生活,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得到“更新”。终于,当人们翻动这部《一生不过一念》散文新集的书页时,犹如抚摸着、欣赏着一匹质地密实精美、淡雅相宜的江南丝绸。

一念既成,万念飞扬。

读林华的散文,是思与美的旅程,可圈可点之处比比皆是。丰富的工作、生活阅历,使他的美篇取材多样、内容丰盈。历史与现实、风物与民俗、现实琐议、身边人事,例如龙窑、大海、矿山、运河、黑金、春风……皆可入眼入心入文。其中的《喜爱雪落无声的意境》《我想建一座凉亭》都让我欢喜。佳作收录成集,正如德清下渚湖湿地的七港八汊,水自四方来,汇聚成河湖。

林华散文的叙事语言也有特点,紧致而持重,简洁而细微,冷峻的修辞风格里,含有温馨的暖意。他的叙事笔调总是不徐不疾、造词遣句疏密有致,可令人长久咀嚼回味。

林华的散文更重哲思,无论描摹还是随感,语言的缝隙里都镶嵌着自己的见解与认知。河与海、煤与窑、英溪帖、阅读与文化、菱角与竹……一点一点抽丝剥茧,思想的提炼条缕清晰。思之有理、言之有物、抒之有情、诉之有度。犹如两山间的高架铁路,凌空而过,既是对大山深涧的跨越,也是对自我的超越。

近年来,人们谈论散文,较多注重内容的现实关注、娴熟的叙事策略、精美的语言文字等“表象”,却常常疏淡了文章的思想内涵。张林华先生的散文集《一生不过一念》,是善念压邪念、正念克杂念的灵魂净化之载体,或许正可补阙。

林华在文尾摘引了尼采的一句话:

“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,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”

一念既起,持续一生。何等美好纯粹的文学人生。

他吟诗的样子

■周翠云

应该说,我是华夏文学创作上的欣赏者、参与者和鼓动者。

恋爱的时候,他就经常给我朗诵诗歌,朗读他的作品。他朗诵和朗读的时候一本正经,感情真挚。我喜欢他这个样子,也喜欢他的声音。

谁不喜欢过一种有诗意的生活呢?哪怕是暂时清贫一些,心里也是甜的,也是充满希望的。

我不但喜欢他的朗诵,还和他一起朗诵。凡是他喜欢的,会背诵的唐诗宋词,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柳永、苏轼、李清照,我都找来背诵,而且很快就记住了。就连那些比较长的唐诗,《春江花月夜》《长恨歌》《琵琶行》等等,只要是他会背诵的,我都会背诵,还有一些他喜欢但是不会背诵的现代长诗,我也会背诵,像食指的《相信未来》,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,戴望舒的《雨巷》,舒婷的《致橡树》等等,我都能流利地背诵下来。

有一段时间,华夏喜欢在家人、朋友聚会的时候,给大家朗诵诗歌。喝了几杯酒有时会忘词儿,这时他就会用求助的眼神看着我,我会立刻给他提醒儿。有时我也会站起来,大大方方地朗诵一首。

每个认识我的人,都说我生活幸福。我确实幸福。用这样的心态去生活,这样的方式去生活,能不幸福吗?我喜欢这种夫唱妇随、琴瑟和鸣的感觉。

华夏在家里人的微信群里朗诵诗词,我也跟着一块儿朗诵。几百首诗词朗诵完了,我又鼓励他朗读美文。他朗读,我也朗读,全家人都跟着朗读,这样的气氛多好。

这才是学习型社会、学习型家庭应该有的样子。心思都用在这样的事情上,还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夫妻反目、家庭不和吗?

后来,华夏把这个经过写成了两个长篇散文,一篇《微信群里的诗意生活》,一篇《我们都是朗读者》,两篇文章发表后都得到了广泛的好评。他的很多散文里都有我的影子,都有我的影响。比如《平凡的生活里总有不期而至的感动》,写的就是我们生活里的一件小事儿。谁也想不到,他会把这么小的事儿,写得这么出彩儿,这么感人,这么有意思,这么有意义,这么大情怀,这么大气象!

写好一件小事儿不易,把一件小事儿写成一个大作品,那就更难了。

这样的作品,起止自在,顾盼生姿。

这样的作品,如细雨润花,又如回风舞雪。

华夏曾写过一篇报告文学《前线》,那是我参与程度最高的一部作品。2003年闹“非典”,我亲临一线,接受了血与火的洗礼,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。回来以后,我把这段经历讲给他听,他听着听着,激动起来,说等等你讲慢点儿,从头儿来,让我记下来。别着急,讲得越细越好。这样,我断断续续讲了三天,他一边听着,一边问着,一边记着。

很快,一篇两万多字的报告文学就在我们的合作中诞生了。因为真实,因为自然,因为朴素,因为平静,因为滚烫,表面平静内心滚烫,所以效果就出奇地好。作品发表后,被多家报刊转载,被收入多种选集。我和华夏一样有成就感。这是他的作品,难道不更是我的作品吗?

我觉得,华夏的散文有两个特点,一个是接地气,一个是感情真挚。

我们一起散步的时候,华夏有时会说,我要写这么一部小说,故事是什么,人物叫什么,人物关系是什么,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,题目叫什么,你觉得怎么样?

我说,好,赶紧写。

或者,他说,我想写一篇散文,想这么写,这么写,你觉得怎么样?

我说,好,赶紧写。

我知道他在干正经事儿,他肯定能把它干好,我就特别高兴,就愿意全力支持。

我常和华夏讲电视剧《士兵突击》里许三多的两句话,一句是“人活着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,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好好活”,还有一句是“不抛弃,不放弃”。我说,对你来说,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情?写作呀。你这么有才华,写得这么好,不写不是浪费吗?还有不抛弃,不放弃,在生活里,就是你不抛弃我不放弃我,我也不抛弃你不放弃你,恩恩爱爱白头到老;在写作上,就是你不抛弃文学,不放弃创作。

他吃惊地望着我,说,你什么时候成了我的导师和政委了?

我说,岂敢岂敢,我永远是你的贤内助和忠实的粉丝,睁着一双崇拜的大眼睛,忽闪忽闪地看着你,看着你好好活,做有意义的事情。

他听了,开怀大笑。

悼伍杰先生

■杨玉圣

顷接马小泉教授信息:“伍杰先生昨天下午三点因病医治无效去世。”

我认识伍先生应该在上世纪90年代初,因为我喜欢写书评,爱读书评类著作,故先读伍先生的书,后认识伍先生。伍先生时任中宣部出版局局长,发起创办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并任创始会长,兼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、《中国图书评论》编委会主任,负责大型文史工程《中华大典》的编纂与出版工作。

1998年6月初,赴美做富布莱特学者前夕,北大读研时的刘雪枫师兄,在辽宁大学出版社为我出版了拙著《学术批评丛稿》、拙编《书的学术批评》,遂在京召开了一个以学术书评为主题的研讨会,伍先生屈尊出席并做主旨发言。

1999年,伍先生与书评家王建辉博士主编的《书评三十家》,由华夏出版社出版。蒙两位书评家厚爱,将鄙人收入其中,应该是三十位入选者中年龄最小、资历最浅者。

我不知天高地厚,呼吁“把书评当作学问来做”,从1991年起,陆续在《世界历史》《美国研究》等学刊,发表多篇以书评为主题的成篇评论。伍先生对我非常理解、支持,还屈尊在《中国图书评论》(2006年第12期)发表近万字的《杨玉圣与书评》,勉励有加。

2003年春,因往台北参加“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”研讨会,与时任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的马小泉教授结识。之后,我和马教授一起,拜访先生。两位出版家成为好友。在马教授支持下,我为先生编纂《书评理念与实践》。该书上下卷,基本搜集了伍先生到那时为止的代表性书评之作。2006年,该书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先生退休后,一直主持《中华大典》这一大型文化学术工程,退而不休,乐而忘忧。

我看过先生几次。先生无官架子,也无学架子,从不摆谱,亲和无间,让人如沐春风。

和先生通电话,老人的声音,同样是亲切、慈祥,底气十足。

近年来,和先生来往很少。现在想来,惟有惭愧。先生走了,惟有遗憾。

在老一辈出版家和书评家中,我和邓蜀生先生来往最多,其次是伍先生,再次是冯亦代先生、戴文葆先生、沈昌文先生。如今,五位前辈均已驾鹤归西。一道文化风景线,随着这些文化老人的辞世,已然飘零。岂不痛哉?岂不哀哉!

在上述五位前辈中,按虚岁论,邓先生享年九旬有九(1923-2021),冯先生享年九旬有三(1913-2005),戴先生享年八旬有七(1922-2008),沈先生享年九旬有二(1930-2021),伍先生享年九旬有三(1930-2022)。五位先生不仅高寿,且均在出版、书评等领域留下了各自的代表性著作。先生肉体虽逝,然其道德文章永存。

谨此哀悼伍杰先生!